

先秦條件句標記「苟」、「若」、「使」的功能*

劉承慧**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 要

本文試圖在事理觀點的標記研究之外，開啓另一種詮釋的可能性，從標記起源與發展的角度，辨析先秦「苟」、「若」、「使」的語義功能。文獻證據顯示它們是有功能分工的。「若」注記相對或不確定條件，言說者可藉此將自身抽離言說情境；「苟」始於注記言說者祈願實現的條件，延伸注記絕對條件；「使」可能始於注記言說者欲使爲真的條件，又延伸注記反向推論的前提。它們都不具有使用上的強制性，使用與否全取決於言說者有意或無意明示其發言態度與立場。先秦「苟」、「若」、「使」真正的功能不在注記條件關係，而在注記條件關係中的言說主觀性。

關鍵詞：條件句，條件標記，語義功能，言說主觀性

一、前言

本文辨析先秦條件句標記（以下逕稱爲「條件標記」）「苟」、「若」、「使」的性質與作用。這三個標記都見於條件句的前項，都不是強制性成分；它們的功能似有重疊，但在先秦文獻中的使用分布卻不相同。它們彼此間的異同究竟反映出什麼樣的先秦語言事實？這是核心問題。

* 本文爲 96 年度國科會計畫（NSC96-2411-H-007-027）成果。本文使用中央研究院古漢語語料庫檢索先秦文獻資料。本文承蒙審查人提供寶貴的參考意見，謹此表示感謝。文責歸屬於作者。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chhliu@mx.nthu.edu.tw。

本文舉證以《左傳》為主，旁及其他先秦文獻。只是《左傳》並沒有以「使」為條件標記之例，因此援引其他文獻中的用例。(註¹)為了聚焦在語義功能上，本文將以「標記」概括關聯副詞與連詞，不更作語法類別的細分。

本文與過去相關研究有兩項區別：(一)過去研究大都把帶有事理關係的句子套入預設的事理框架，把句中標記聯繫到事理上，本文不以事理為出發點，直接針對標記進行辨析；(二)先秦語法標記大抵是多功能的，然而過去研究卻很少從概念延伸的角度去解說標記來源之於功能的制約，本文擬構虛化的路徑，從來源義涵闡釋條件標記「苟」、「若」、「使」功能分工的事實。(註²)

在進入討論之前，首先要聲明，本文提出的功能分工只是一般性傾向，不是絕對或嚴格的功能類型區分。「苟」、「若」、「使」在先秦文獻分布參差，「若」最常見，因而「苟」與「使」的標顯性(markedness)高於「若」。其次，「若」與「苟」或「使」有時候在同一文篇裡交替使用，「若」又與「苟」或「使」並列複合為「若苟」、「若使」。這意味著「苟」、「若」、「使」之間存有某種交互關係。

二、條件句

呂叔湘(1956)把廣義的因果句分為「(狹義)因果句」、「推論句」、「假設句」三種類型，推論句與假設句在本文中合稱為「條件句」。(註³)條件句由條件關係結合句中的前項與後項，而條件關係有兩種典型，一是前項為後項的推論依據，二是前項為後項成立的前提。例如：

(1)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左傳·隱公元年》)

1. 這其中可能涉及方言差異問題，但不影響本文的論證效力，因為我們嘗試闡述的是標記起源發展之於標記功能的制約。假使涉及方言差異而制約表現一致，就說明它是先秦各地區普遍存在的語言實情。
2. 先秦文獻還有個前項標記「如」，也是從類似義動詞演變為條件標記，演變過程跟「若」很接近但不及「若」常用。我們沒有將「如」納入討論，是因為本文主旨在於辨析不同來源之前項標記的功能分工，「如」、「若」相仿而「若」較常用，故而略過「如」，以使論述焦點保持明確。
3. 在某些現代漢語複句研究著作中，「條件句」所指範圍很小，例如邢福義(2001)界定的條件句只限於表示必要條件的「只有……才……」和表示充分條件的「只要……就……」兩種。先秦漢語並沒有完全對當的句式或標記。本文「條件句」對應普通語言學術語“conditional sentence”。

(2)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同上）

例(1)中「厚將得眾」、「厚將崩」的前項「厚」意指大叔勢力雄厚，以既成事實為條件，後項「將得眾」、「將崩」是就同一條件作出的推論。^(註4)例(2)中「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由前項提出設想情況，後項分別提出兩種情況下的處置辦法。例(1)為呂叔湘所謂的推論句，例(2)為假設句，本文都稱為條件句。

條件句未必由標記注明。「欲與大叔，臣請事之」、「厚將得眾」、「厚將崩」都不用標記。然而「若弗與，則請除之」卻是前後項兼用「若」、「則」。不用標記是先秦因果句的常態，至於何種情況下使用標記，仍待進一步觀察。

根據呂叔湘的分析，推論句和假設句有別於狹義因果句，在於後項所述虛實不同。狹義因果句的後項是「實」說，推論句和假設句的後項是「虛」說，即如表一所示：

表一：廣義因果句的類別（呂叔湘 1956）

假設句	若甲則乙	甲乙皆虛
推論句	既甲應乙	甲實乙虛
因果句	因甲故乙	甲乙皆實

呂叔湘又由前項虛實區別假設句和推論句，本文不予區別，是因為先秦時期沒有足以支持兩者對立的形式證據。^(註5)更重要的是，前項的虛實並不總是能夠清楚分判的。試比較：

(3)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告則否。（《左傳·隱公十一年》）

4. 此例按照古漢語語料庫原樣標點，但在前項與後項之間添加逗號，即「厚，將得眾」、「厚，將崩」較有利於反映條件句的構成方式。又「不義，不暱」為「厚將崩」成立的前提，這兩個句子也是由條件關係相結合。為行文簡潔起見，除非是討論跨句事理，否則從略。

5. 現代漢語中的「既然」和先秦狀語「既」有淵源。根據蒲立本（Pulleyblank 1994），先秦「既」是既成貌（PERFECT aspect）標記。「既」在先秦文獻偶有引申出相當於現代「既然」的用例，不過確立為條件標記應在中古初期。

(4)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採樵者以誘之。」(《左傳·桓公十二年》)

例(3)「告則書，不告則否」中的前項「告」、「不告」提出不定指條件，可以視為虛說。但例(4)「輕則寡謀」中的前項「輕」承接上文「絞小而輕」，「小而輕」意思是「地方小而人的態度輕率」，是出於屈瑕對絞國的認知，「輕」是實說還是虛說呢？再請看例(5)：

(5)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左傳·哀公十四年》)

這番推辭由三個條件句組成：「臣之罪大」是實說；「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是虛說；「若臣」的「臣」為言說者自稱，試問「若臣」虛實如何？(註6)前項的虛實曖昧反映出虛實應非其區別特徵。

三、多功能與功能引申

先秦語法標記的多功能現象很容易從傳統辭書的訓解條目得知。解惠全等(2008:589-604)匯集元代以降七部辭書對古代文獻「若」的訓解，整理出三十二個條目。這些條目都是隨文解義所得，顯示在不同組合環境或不同使用情境下「若」涵攝的各種概念及功能。

古代文獻中的字形往往不只代表單一的詞形，這三十二個條目顯示「若」也是一個字形對應多個詞形。(註7)不過，我們應該可以藉助其他線索，從中梳理出屬於條件標記「若」的引申脈絡。朱德熙(1988:85-86)提到「類似」和「假設」應該是相通的概念，拉丁語的“si”、荷蘭語的“zoo”，還有現代漢語中的「若」、「如」都以同一詞形兼表兩者。先秦文獻中的「若」涵攝「類似」、「比況」、「條件」，即是平行現象。

6. 既然是言說者自稱，似應為實說，然而「若臣」是與虛說的「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並舉的條件，兩者的虛實狀態理當一致，就此而言又似為虛說。

7. 這些條目反映出「若」至少代表兩個詞義發展的支脈，一支以類似義動詞「若」為起點，另一支以指代詞「若」為起點。本文只討論類似義一支的引申情況，詳見第三、四、六節。

條件標記「若」如何從類似義動詞衍生出來，這個問題還沒有釐清。我們由文獻證據推測，它從類似義動詞到條件標記的演變過程中存在一個很重要的過渡階段，就是「比況」。試看：

(6)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左傳·昭公元年》）

例(6)大意是「水旱癘疫之災」之於「山川之神」就好比「雪霜風雨之不時」之於「日月星辰之神」，又好比「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之於「君身」：「山川之神」同「日月星辰之神」同「君身」有比況關係。準此，「若君身」的「若」應為類似義動詞在文篇中的延伸，注記比況。「若君身」與「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共成一個完整句，句中的前後項以條件關係相結合，因此「若」也可視為條件標記。例(6)反映出「若」在特定組合情況下同時注記比況和條件，是推察引申路徑的重要線索。

回到傳統辭書中的訓解，套用現代語言學的觀念和術語來說，訓解條目即是功能標記的語用分析，是研究古代文獻語言很重要的參考資料。不過，相關訓解條目之間的引申流變還需要文獻證據予以支持，而像例(6)這樣的兩解案例應是確認引申淵源的關鍵證據。

四、功能引申的詮釋

讓我們繼續推察「若」如何從類似義動詞演變為比況標記。請看例(7)：

(7)君所謂可，據亦謂可；君所謂否，據亦謂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左傳·昭公二十年》）

例(7)中「君」指齊侯，「據」指梁丘據；晏子拿「以水濟水」、「琴瑟之專壹」來比況梁丘據對齊侯的絲毫不違逆，即「君所謂可，據亦謂可；君所謂否，據亦謂否」。「若」是跨句的比況標記。它和例(6)中表示比況的「若」同樣是從文篇才能識別的跨句標記。

Traugott and Dasher (2005:40) 指出,當實義的 (contentful) 成分朝著表示抽象流程的 (procedural) 成分演變,可能伴隨著功能範圍的改變,從句內延伸到句間或文篇。比況標記「若」標注完整句 X 與完整句 Y 的比況關係「X, 若 Y」,組合方式與類似義動詞「若」構成「A 若 B」一致,表示相似性的義涵也一致;類似義動詞是句內表述成分,例(6)–(7)中的比況標記都是跨句成分,按照上述 Traugott and Dasher 所說的實義成分虛化現象,可以假設比況標記「若」源自同形的類似義動詞,而注記跨句成分之間的比況關係是語義延伸的第一步。

再從語義的變化來說,「若」跨越實詞和功能標記的藩籬,涉及虛化歷程,與 Sweetser (1990) 所說的「實然世界到非實然世界的隱喻」(metaphorical extension from physical world to epistemic worlds) 有關,與 Traugott (1989) 所謂的「主觀化」(subjectification) 也有關。簡言之,它基於類似義動詞所隱含的比較概念,從實存事物之相似性的比較投射到設想情況之相似性的比較,這是隱喻。至於從類似義動詞轉變為比況標記,也就是從一個指涉客觀實存相似性的表述成分,轉變為注記言說主觀認定之相似性的標記,即為主觀化——當言說者越來越忽略現實世界的相似性基礎,更為倚重其內在對於事物或事理之間相似性的聯想,「若」就自然會朝著比況標記的方向演變。

例(6)–(7)中的「若」都具有雙重功能。比況是就句間事理而言,如果就句內事理來說,帶「若」的前項以條件關係與後項相結合,將會基於句內語義聯繫而自然取得注記條件的解釋。亦即注記條件最初應是比況標記的附屬功能,是源於注記句間比況關係的「若」,在特定組合情況下同時被解釋為句子內部條件關係的標記。我們據此假設引申路徑如下:

類似義動詞 > 比況標記 > 條件標記

從比況標記分化出條件標記,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注記條件的功能不再是比況標記的附屬功能。先秦文獻中大多數的「若」與比況無關,可見已經確立為條件標記,然而類似義動詞及比況標記所隱含的相對性特徵依然保留,也使得它與同時期另外兩個條件標記「苟」、「使」有所區別。

同理,「苟」、「使」也是引申的產物,它們基於各自的來源與發展歷程,形成不同的語義功能限定。

五、「苟」的來源及功能

根據楊樹達（1929）卷三的分析，「苟」至少涵括三個義項：（一）相當於「苟且」或「姑且」；（二）相當於「尚」，多用於祝禱時，表示祈願或希望；（三）用於表示條件。（註8）從祝禱時可能存有的僥倖之心來說，三個義項之間應該是有某種引申淵源的。

公認先秦「苟」、「若」都相當於現代漢語「如果」，然而它們的使用分布其實不相同。「苟」在《左傳》常用於提出交換條件。例(8)「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是衛侯向周歃、冶廩談判時所說；衛侯要兩人接納他重回衛國，以封賞爵位作為交換，「吾使爾為卿」的前提是「能納我」。「苟能納我」隱含言說者的期待，他要對方的接納能夠實現，這層意思是通過「苟」顯示出來的。

(8)衛侯使賂周歃、冶廩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左傳·僖公三十年》）

(9)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闔，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左傳·昭公五年》）

例(9)「苟得志焉」也表達主觀意願；楚王為了滿足羞辱晉國的願望，不惜以任何有損楚國利益的代價作為交換，因此才說「無恤其他」。下文中「若吾以韓起為闔，以羊舌肸為司宮」的「若」也注記條件。然而這個「若」是不是能由「苟」來替換呢？試比較：

(10)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長短，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傳·文公十三年》）

8. 楊樹達原稱為「假設」，本文改稱為「條件」。

邾文公在同一次對話裡兩度用「苟」：「苟利於民」是條件，「孤之利也」是以此為條件而提出的斷言；「民苟利矣」是條件，「遷也」是斷言，也是命令。^(註9)「苟」表示條件的同時，也反映出言說者的意願，後面這一層意思超出了「若」的功能範圍。回到例(9)「若吾以韓起為闔，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倘或以「苟」代「若」，則無異增添原本不存在的暗示——楚王真正的意圖是要趁機給晉國一個難堪，所以「苟得志焉」用「苟」，至於採取什麼辦法，他並不堅持，因此「若以韓起為闔，以羊舌肸為司宮」用「若」。

先秦「苟」、「若」同樣是條件標記，功能意義卻有重大區別，是根源於由來不同。以「苟」注記交換條件應是來自祝禱時表示希望。試看：

(11) 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穀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祝於穀社也，^(註10)『苟使我皆視』。豈不謬哉！」（《墨子·耕柱》）

(12)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珏，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沉玉而濟。（《左傳·襄公十八年》）

(13) 乃復輔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左傳·襄公十九年》）

例(11)「苟使我和」、「苟使我皆視」都是祝禱之辭，「苟」注記祝禱者的主觀願望。例(12)以承諾「官臣偃無敢復濟」接續祝禱辭「苟捷有功」，兩個成分就形成條件關係。例(13)「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是誓詞，嚴正應允將繼續對齊國的軍事行動，因而與前行的勸說死者瞑目安息的祝禱辭「主苟終」形成條件關係。例(12)、(13)的條件關係就像例(8)有交換意味。

大凡言說者的冀求或期待，都是希望成真的，這是以「苟」注記交換條件的

9. 就條件關係來說，「遷也」是斷言，就邾文公的地位與發言意圖來說，「遷也」是命令。斷言意義由前後項的條件關係決定，命令意義則由言說語境決定。

10. 據孫詒讓《墨子閒詁》引俞樾的說法，「也」當作「曰」才合於上下文義。不過無論「也」是否為「曰」之誤，都不會影響「苟使我皆視」的詮釋。

心理基礎。交換條件也可以說是言說者認定的絕對條件或唯一條件。《左傳》記事文本裡的「苟」全都表示絕對條件，如例(14)–(17)所示：

- (14)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待。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左傳·襄公十年》))
- (15) 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左傳·文公十年》))
- (16) 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駢。((《左傳·襄公十七年》))
- (17) 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左傳·定公十四年》))

以此解釋例(18)句內分用「苟」、「若」的緣由，那就是「苟有盟焉」由「苟」提出絕對條件，「若猶可改」僅為一般設想之辭。

- (18) 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左傳·哀公十二年》))

現代漢語最接近先秦「苟」的對應形式不是「如果」，而是「只要」。解惠全等(2008)指出傳統注釋為「但」的「苟」不僅與姑且義的「苟」有關，也與表示假設的「苟」有關，而假設連詞「苟」大都相當於「只要」。(註 11)這是符合先秦語言實情的詮釋，不過以下三例中的「苟」仍被視同「若」、「如」(頁 218)，我們認為還有商榷的餘地。

- (19)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經·繫詞》))
- (20) 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禮記·中庸》))
- (21)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蓄，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孟子·離婁上》))

三例中的「苟」都無法由現代「只要」翻譯，這或許是沿用「若也」、「如也」詮釋的主要理由；不過，要是擱置現代標記「只要」的參照，直接以「絕對條件」

11. 詳見解惠全等(2008:216-219)為特定訓解條目所作的按語。

來解說，將更符合先秦語言實情。(註12)

六、「若」的來源及功能

先秦「若」這個詞形代表多個不同的詞，(註13)本文囿於主旨，只討論從類似義動詞延伸出來的「比況」、「條件」範圍內的相關現象。條件標記「若」來自比況標記，儘管已經成為見頻最高的條件標記，仍有比況和條件兩解的用例：

(22)君所謂可，據亦謂可；君所謂否，據亦謂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若琴瑟之壹，誰能聽之？(《左傳·昭公二十年》)

(23)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

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左傳·襄公十九年》)

(24)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

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左傳·隱公元年》)

例(22)已見於第四節例(7)，由於是關鍵用例，再次提出。句中的「若」有兩重功能，就上下文脈聯繫而言，「以水濟水」、「琴瑟之壹專」是針對上文「君云亦云」所作的譬喻，「若」是從類似義動詞延伸而來的比況標記。另一方面，「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壹專，誰能聽之」各自成句，就句內事理而言，「若」注記條件關係。

例(23)「如百穀之仰膏雨焉」比況小國對大國依賴之深，「若常膏之」的「若」承接上文的「如」，顯示下文是延續這個比況，而「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內部又形成條件關係，「若」具有雙重功能。

例(24)「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是潁考叔順著鄭莊公先前的誓言「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所提出的委婉建議，「若」相當於「比方說」、「好比」之類；再就句內

12. 先秦表示絕對條件的標記「苟」現代沒有完全對應的形式，反映出語言形式與內容變遷的歷史現實。這種變遷是很隱微的，但是對於先秦語言系統乃至漢語歷史發展的擬構，意義重大。

13. 請參閱解惠全等(2008)「若」條目之下的分析。

事理來說，「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是「其誰曰不然」的前提，「若」又是條件標記。

例(24)中的「若」傳達出一種不確定的口吻，這種口吻出現在臣下對君上的建言之中是很自然的。同樣的口吻也常見於《左傳》外交辭令。試看：

(25)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左傳·昭公三年》）

例(25)交替使用「若」和「苟」。這段話的上文是鄭國向晉國告饒，表明在楚國威逼下不得不派人朝覲楚王。叔向的答話以「君苟思盟」、「苟有寡君」傳達晉國不允許鄭國違背盟約的堅定態度；「君若辱有寡君」、「君若不有寡君」則是無預設立場的不確定說辭，隱含的意思是能不能信守盟約要看鄭國自己。「若」、「苟」並用，清楚地展現出大國統御小國軟中帶硬的手腕。

再者，「君若辱有寡君」、「君若不有寡君」是以正反之辭對舉。或許是因為源自比況標記的緣故，「若」常用於注記相對條件。例(26)「若安定之」、「若不恤其患」是以肯定與否定相對；例(27)「若以德綏諸侯」、「若以力」則是以恩德與暴力相對。我們統計出「若」在《左傳》外交辭令共有一百二十八例，「苟」只有十四例，大量用「若」而少用「苟」，充分顯示外交修辭的特性。

(26)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左傳·襄公二十二年》）

(27)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左傳·僖公四年》）

這種功能還有進一步延伸。例(28)「若其不許」是相對於「大夫之許」而言。齊晉兩國交戰之前，齊侯向晉師約戰，晉人答應了，齊侯以「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收束約戰的程序——前半段顯示齊侯明白對方已經接受挑戰，卻仍不煩冗贅地說出「若其不許，亦將見也」，似乎要藉由「若」注記

相對條件的功能來重申對壘決心。(註14)

(28)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左傳·成公二年》)

相對性是先秦「若」很顯著的語義特徵。第二節例(5)中的「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同樣是以「若」注記相對情況。再舉一個平行之例：

(29)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孟子·公孫丑下》)

例(29)轉引自解惠全等(2008:598)，書中列出《詞詮》、《助字辨略》、《經傳釋詞補》之說，把例(29)和例(5)中的「若」都視為轉接之辭，又附上按語指出這種用法是動詞虛化的產物。(註15)在我們看來，這兩個用例都是通過相對性來表示差異性。例(5)所錄對話背景是宋國向巢因罪出奔，宋公派人挽留他，他以「若臣」表示個人與氏族命運的差異性，以此婉拒。例(29)「若於齊」由「若」注記在齊與上文「在薛」的差異性。「若」應是由類似義動詞引申為比況標記，再基於比況隱含的相對性，延伸出「說了一事別提一事」的轉接功能。

傳統語文學者指出有些用例中的「若」相當於「或」，在我們看來正是相對性與不確定性的具體表現。請看傳統學者解為「或」之例：

(30)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左傳·昭公十三年》)

(31)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

14. 例中的「若」相當於現代漢語的「即使」、「就算」。前面提到「若」經常被視同「如果」，這個用例顯示先秦的「若」和現代的「如果」也不是完全對應的。

15. 解惠全等(2008:598)按語為「此項用法由動詞及義或像義虛化而來，可譯為至於」。我們認為從類似義動詞(即按語所說「像義」)虛化的可能性較高。餘見正文。

命。」(《左傳·定公元年》)

例(30)、(31)轉引自解惠全等(2008:594)。例(30)「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是子革建議楚王「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被駁回之後又提出的建議，^(註 16)都是以「若」注記其他方案。例(31)「若從踐土，若從宋」也是以「若」提出不同選項，因而被視同「或」。例(30)、(31)就像例(24)是以不帶堅持的不確定口吻發言。這種口吻的延伸即是用「若」委婉表示請求，如例(32)、(33)所示：

(32)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左傳·哀公十五年》)

(33)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左傳·隱公四年》)

用「若」提出請求，有別於用「請」或「敢請」，在於發言的角度不同。後者直接表達主觀願望，即便有謙敬之意，畢竟是站在己方立場發言。例(32)、(33)將願望置入條件構式「若～則～」的前項，淡化了己方色彩，相對就彰顯了對方的決定權，有抬舉對方的意味。若套用 Traugott and Dasher (2005) 的術語，這種案例應是「交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 的表現。

七、「使」的來源及功能

先秦「使」大多用為動詞。以「使」為條件標記的用例《左傳》沒有，但是見於其他幾部傳世文獻。「使」從使令義動詞演變為條件標記，也有致使與條件兩解的過渡用例為證。這些過渡用例又可分為三種類型。試看：

(34)公喟然嘆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35)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

16. 子革提出的兩個建議，意思相當於條件句「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可也」、「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可也」，只是措辭方式不同，但「若」表示相對性的功能一致。

(同上)

(36)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國語·吳語》)

使令義動詞「使」隱含發號施令者的主觀意志，而當主觀意志無法落實，就止於內心的設想或期盼。準此，例(34)「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中的「使」是指涉言說者的期盼；又若是把後項「豈不樂哉」結合起來，「使」很容易被解釋為條件標記。(註 17)倘或與後接成分不構成推論關係，「使」單單指涉言說者的期盼，即如例(35)「使古而無死，何如」所示。例(36)情況與例(34)相仿，因為吳王夫差愧對伍員，「使死者無知」應是他內心的期盼；「使死者無知，則已矣」前後項以條件關係相結合，「使」是條件標記。

例(36)中「使」、「若」並用。單就提出條件的措辭方式來說，「使死者無知」透露出吳王愧對伍員的心情，而「若其有知」提出另一種可能性，這個案例可與第五節例(18)「苟」、「若」並用之例相對照。(註 18)

其次，例(37)「能意者」或指能意這個人，或指像他這樣的人。「使謹乎論於主之側」是致使與條件兩解的；「使」一方面表示設想中的使令義，再一方面注記前後項的條件關係。例(38)「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組成方式值得留意：就「善扁鵲」而言，「使」為使令義動詞，就「無臃腫」而言，「使」是條件標記，若從區別的角度來說，更貼近的措辭似應為「使無臃腫而使善扁鵲也」。那麼究竟「使」有沒有注記條件的作用？試比較例(39)「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使」不含使令指涉，僅只注記條件，而措辭仍如「使善扁鵲而無臃腫」。可見這種組合也是引發使令義動詞「使」虛化為條件標記的環境。例(37)－(39)中的「使」都不涉及言說者內心的期盼，有別於前一種類型。

17. 更確切地說，「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是「樂」得以成立的前提，而後項「豈不樂哉」由反詰形式來強調對「樂」的肯定，因此前後項存有條件關係。

18. 我們是由「使死者無知」用「使」而推測吳王是有某種期盼的，這種期盼是否如審查人所說的旁及言說者不樂見的「死者有知」，從字面上難以判斷。衡諸先秦文獻中「若」的用例，「若」這個標記本身或者對言說主觀沒有特別的暗示，甚至言說者可能刻意藉由「若」淡化發言立場，將自己與情況彼此切割。因此縱使期盼旁及「死者有知」，也非源自「若」，是源自對上下文脈的判讀。「若其有知」是順著「使死者無知」說的，「若」注明言說者還意識到相對情況。因此可以說例(36)中並用的「使」、「若」反映言說者內在不同層面的心理或意念。

(37)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呂氏春秋·貴直》)

(38)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戰國策·韓三》)

(39)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呂氏春秋·慎人》)

又其次，例(40)「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中的「使」已由致使義動詞轉為因果標記，注記結果成分，相當於「讓」。(註19)「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承接因果脈絡，「使」同樣注記非實然因果關係中的結果成分，因此可以視為因果標記。這個詞組又與「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形成條件關係，因此「使」也是條件標記。

(40)大臣挾愚污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韓非子·孤憤》)

例(34)–(40)顯示條件標記「使」的虛化與實然到非實然的語義引申有關，也和文篇中的因果脈絡有關。亦即條件標記「使」是源自多種組合環境。

呂叔湘(1956)第22.33節指出「使」多用於表示與事實相反的假設。從功能引申的角度來說，條件標記「使」源自於表達非實然的致使概念，與事實相反的假設僅為非實然的一種類型。當言說者內心期盼與事實有出入，「使」注記的條件就與事實相反。請看例(41)：

(41)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進？」(《戰國策·齊四》)

(42)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治也。(《管子·明法解》)

這種條件雖與事實相反，著眼點卻不在「事情的真偽」，而是言說者藉此進行

19. 前項「大臣挾愚污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是原因成分，後項「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是結果成分。

反向推論。同樣地，例(42)「使人不欲生，不惡死」承接上文「以欲生而惡死也」而來，提出與上文推論相反的假設，進行反向推論。再者，例(43)–(45)中的「使」都是條件標記：

(43) 紹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戰國策·齊六》）

(44)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論語·泰伯》）

(45) 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益；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戰國策·趙四》）

例(43)「使公孫子與徐子鬪」是致使與條件兩解的，但「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的「使」不含致使或因果義，純粹注記條件。例(44)「使驕且吝」的「使」只容許解釋為條件標記。例(45)「使安平君愚」、「使安平君知」中的「使」注記對立的條件，表現和「若」相當接近。由此可見「使」很可能開始脫離來源義的制約，朝著條件標記方向演變。

最後，注記反向推論的前提是條件標記「使」有別於「若」、「苟」的特徵。試以例(42)與下面例(46)略作比較：

(46) 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左傳·昭公二十一年》）

例(46)「若不亡」就像例(42)前項「使人不欲生、不惡死」，注記與上文所述相反的條件，但例(46)「是君也必不終」提出進一步斷言，例(42)「則不可得而治也」提出反向推論。例(38)、(39)及(41)、(42)都是反向推論的案例，都由「使」注記。

八、「若苟」和「若使」

先秦文獻中「苟」、「若」、「使」絕大多數都是單用，但偶有兩兩並列複合的

情況，如「若苟」、「若使」。《墨子》是先秦原典中同時採用「若苟」、「若使」極具代表性的文本，它們在《墨子》都是以限定較少而通用程度較高的「若」標注另一成分的語義引申，但《左傳》中的「若苟」卻是通過「苟」加諸「若」某種語義限定。^(註 20)條件標記以並列複合為途徑，注明功能游移或延伸。

(一)「若苟」

條件標記「若苟」由「若」、「苟」並列複合而成。先秦傳世原典只有《墨子》和《左傳》出現過這種複合標記。先看《墨子》之例：

(47)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與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墨子·節葬下》）

(48)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墨子·尚賢中》）

例(47)「若苟貧」、「若苟寡」、「若苟亂」上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而來。例(48)「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承接反詰問句「請問天下之賢臣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反詰意在強調「天下之賢臣將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這正是「若苟」提起的條件。《墨子》總共出現過二十一個由「若苟」注記條件的用例，其中有二十個都是以它鄰近位置上的成分為條件，只有一例是重述文篇先前已經提出的主張，如(49)所示：

(49)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眾能為之……」（《墨子·兼愛中》）

如果就墨子這次的發言來說，「若苟君說之」之前並未提到「君說之」，不過就更大的上下文來說，這句話所在的文篇先前已經三度提到「君說之」：最初以「苟君說之，則士眾能為之」的條件句開啓論述，接著以楚靈王喜好細腰而使臣下寧

20. 同義並列複合內部成分的語義制約關係，請參閱劉承慧（2002, 2003）。

可忍饑挨餓也要力求消瘦為例，歸結出「君說之，故臣爲之也」，其後以越王句踐喜好勇士使得臣下爭相奔赴火場為例，確認「君說之，故臣能之也」。例(49)「若苟君說之，則眾能爲之」再次重複同樣的道理。

在《墨子》文本中，所有由「若苟」注記的條件都涉及言說者設定或推定爲真的內容，而這也是「苟」的功能。先秦「苟」表示祈願，也表示條件，第五節例(11)—(13)顯示祈願到條件是有引申關係的。假設「苟」先引申出主觀意願下的條件，再擴及言說者設定或推定爲真的條件，即如以下所示：

表示祈願 > 注記主觀意願 > 注記言說者設想或推定爲真的條件

據此而言，《墨子》中的「若苟」是以「苟」爲基底，與不含主觀意願的「若」相複合，彰顯其功能爲注記言說者設想或推定爲真的條件。

再看《左傳》中的「若苟」。《左傳》只出現兩個「若苟」用例，都用於外交辭令，即例(50)、(51)：

(50)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左傳·成公二年》）

(51)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左傳·昭公四年》）

第六節提到，「若」是先秦最普遍的條件標記，它暗示「言說者對於所提出的條件並沒有個人堅持」，而外交辭令經常使用「若」提出委婉的請求。讓我們據此詮釋例(50)、(51)中的「若苟」。例(50)是齊國和晉國在鞏地交戰之後齊國向晉國行賄求和而晉國應允講和的答話，「若苟有以藉口」將語調委婉的「若」與表達主觀態度的「苟」並列複合，顯得既客氣又強硬。例(51)的發言背景是楚國有意在諸侯間擴張勢力，派椒舉去請求晉國同意諸侯朝覲楚國；表面上是請求，話也說得很曲折，「若苟」卻暗指楚國不過是知會而已。

由此可見《左傳》中「若苟」的複合緣由有別於《墨子》中的「若苟」，它是以「若」爲基底，和涉及主觀意願的「苟」相複合，暗示所提出的條件背後隱藏

言說者的主張。因此《左傳》、《墨子》中的「若苟」功能不同，是同形異詞。

(二)「若使」^(註 21)

接著討論複合的條件標記「若使」。「若使」是「使」從使令動詞演變為條件標記過渡階段的產物。^(註 22)前面提到，動詞「使」隱含發號施令者的主觀意志，但若是主觀意志無法落實，就只是內心的設想或期盼。準此，例(52)中晏子說「若使古而無死」就正和齊王說「使古而無死」形成有意義的對照。齊王企盼「古而無死」，晏子沒有相同的想望，他還要勸齊王打消念頭。可以說晏子用「若使」就消除了「使」的語義暗示。

(52)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

晏子曰：「……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皆將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鉞耨以蹲行畎畝之中，熟暇患死！」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53)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墨子·公孟》)

例(53)中的「若使孔子當聖王」是與現實對立(違反現實)的設想，「若使」有別於「使」，就在於「若」消除了「使」可能隱含的主觀願望的意味。先秦傳世文本《墨子》、《韓非子》、《晏子》、《呂氏春秋》共出現十三個「若使」用例，全不涉及言說者內心期盼。不含主觀暗示的「若使」無寧近於「若」，如例(54)「若使鬼神請有」、「若使鬼神請無」所示。這個用例可與例(45)相對照。

21. 先秦有兩種「若使」，一是條件標記「若」和使令動詞「使」前後並立，二是「若使」合為單一標記。前者如「若使吳王知之，若何？」(《左傳·哀公二十年》)，「使」就相當於「讓」，而「若」為條件標記。複合為單一標記之例如「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呂氏春秋·應言》)，這句話是魏敬勸阻魏王親身到訪秦國時所說，「若使」為複合標記。本文討論後者。

22. 以下是條件標記「使」、「若使」、「如使」在幾部先秦傳世原典的大致分布狀況：《易·繫辭》、《左傳》、《荀子》都不以「使」、「若使」或「如使」為條件標記；《論語》僅有單用「使」一例；《墨子》單用「使」一例，「若使」四例；《韓非子》單用「使」七例，「若使」三例。《戰國策》比其它先秦文獻更常以「使」為條件標記，但「若使」只有一例；《孟子》單用「使」一例，「如使」三例。「使」、「如使」、「若使」在《孟子》、《墨子》交替使用，反映出「使」演變中間階段的不穩定狀態。

(54)今絜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隨酒禮粢盛之財耳。
(《墨子·明鬼下》)(註 23)

根據例(44)「使驕且吝」及例(45)正反對舉的「使安平君愚」、「使安平君知」推測，「使」也引申出不含主觀性的用法。《墨子》「若使鬼神請有」、「若使鬼神請無」由「若使」注記，「若」只是冗贅成分，這與同一部文獻二十一個「若苟」全都注記「苟」的既有功能是平行現象。冗贅的複合形式「若苟」、「若使」同時出現在《墨子》文本，或許是它的作者或記錄者對於分辨意義有高度自覺，因此傾向由「若」來幫助識別處於變動中的「苟」、「使」的功能。(註 24)

九、功能分工

先秦「苟」、「若」、「使」都是來源義與引申義並行的多功能成分，它們作為條件標記的功能也受到來源義牽制。以下是我們為先秦條件標記「苟」、「若」、「使」功能分工提出的初步假設：

- ◎苟：注記言說者祈願實現的條件或絕對條件
- ◎若：注記言說者認為具相對性、選擇性或不確定性條件
- ◎使：注記言說者欲使為真的條件或反向推論的前提

再重申兩點。首先，「苟」、「使」都注記言說者主觀意願下的條件，不過「使」偏用於注記明知不可能為真的條件，言說者以此表白內心想望，「苟」注記言說者認為可能實現卻超乎自身掌控的條件，用於談判時交換利益。其次，「若」注記的條件具有相對性或不確定性，言說者可藉此暗示置身事外的立場，或暗示決定權不在己方，因此表達功能有別於「苟」和「使」。

本文討論的三個標記都是虛化產物，它們共同的虛化環境是條件句，之所以

23. 據孫詒讓《墨子閒詁》，「請」應作「誠」。

24. 這個現象很可能反映在《墨子》寫定年代，其所屬方言「苟」、「使」處於演變過渡階段。我們另有專文討論並列複合標記在漢語演變過程中的識別作用。請參閱劉承慧（2010）。

被視為條件標記，是因為用於條件句的前項。不過，先秦條件句基本上是不需要標記的，條件標記的興起也並沒有改變無需標記的語言事實。第二節提到，先秦條件句在何種情況下使用標記，過去並沒有深入討論。本文例證說明前項常見的三個標記的使用趨勢——言說者選擇與表達意圖相配的標記彰顯他的發言態度與立場。也就是說，這些標記真正的作用不在注記條件因果事理，使用與否取決於言說主觀性。

十、結語

本文擱置現代漢語同功能標記的參照，從可能的來源及引申途徑去詮釋先秦條件標記「苟」、「若」、「使」。它們從實詞虛化，受到來源實詞義涵的影響，因此形成功能分工；它們在先秦階段並沒有演變為專門注記事理的標記，在因果事理層面上也不具使用強制性。

最後提出與本文研究相關的問題。本文例證顯示，先秦時期「使」已經開始朝著「若」的方向演變，承襲自使令動詞的義涵有減弱跡象，因而與「若」略有功能重疊，它的後續發展如何，很值得繼續探究。漢代以後「苟」走上衰微，注記絕對條件的功能在後世由哪個標記來承接，同樣值得關注。

先秦條件句後項也有標記，最常見的是「則」、「即」。後項標記有時候與前項標記並用，如例(2)「若弗與，則請除之」兼用「若」、「則」，例(42)「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治也」兼用「使」、「則」。先秦條件句的前後項標記如何分工？在什麼情況下前項與後項標記並用？這是我們下一步探討的課題。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孫詒讓，《墨子閒詁》，臺北：華正書局，1987。

二、近人論著

- 朱德熙，〈關於先秦漢語裡名詞的動詞性問題〉，《中國語文》，203，北京：1988，頁 81-86。
- * 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56[1985]。
- 邢福義，《漢語複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 * 楊樹達，《詞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29[1987]。
- * 解惠全、崔永琳、鄭天一編，《古書虛詞通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
- * 劉承慧，〈試論漢語複合化的起源及早期發展〉，《清華學報》，32.2，新竹：2002，頁 469-493。
- * ——，〈古漢語實詞的複合化〉，收於何大安主編，《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與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3，頁 107-139。
- * ——，〈漢語並列複合標記的作用——從唐宋時期的並列複合標記「了也」談起〉，《語言暨語言學》，11.2，臺北：2010，頁 393-424。
- Pulleyblank, Edwin. "Aspects of Aspect in Classical Chinese," in R. Gassmann and L. He eds., *Paper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re-Qin Chinese Grammar*.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1994, pp. 313-363.
- * Sweetser, Ev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 Traugott, Elizabeth.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5.1, 1989, pp. 31-55.
- * Traugott, Elizabeth, and Richard Dasher.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Liu, Cheng-hui. "Shilun Hanyu Fuhehua de Qiyuan ji Zaoqi Fazhan (On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pound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2.2, 2002, pp. 469-493.
- . "Guhanyu Shici de Fuhehua (On Compounding in Classical Chinese)," in Dah-an Ho e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2003, pp. 107-139.
- . "Hanyu Binglie Fuhe Biaoji de Zuoyong—Cong Tang-Song Shiqi de Binglie Fuhe Biaoji 'Liao-Ye' Tanqi (On the Role of Coordinative Compounding in Chinese: A Case Study of the Grammatical Marker *Liao-Ye* and Other Related Coordinative Markers in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2, 2010, pp. 393-424.
- Lü, Shuxiang, *Zhongguo Wenfa Yaolue (Outline of Chinese Grammar)*. Taipei: Wen-shi-zhe Chubanshe, 1956[1985].
- Sweetser, Ev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Traugott, Elizabeth.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5.1, 1989, pp. 31-55.
- Traugott, Elizabeth, and Richard Dasher.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Yang, Shuda. *Ci Quan (Annotations on the Function Words in Classical Chinese)*.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9[1987].
- Xie, Huiquan, Cui Yonglin, and Zheng Tianyi (eds.). *Gushu Xuci Tongjie (Collected Annotations on the Function Words in Ancient Book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Protasis Markers *Gou* 苟, *Ruo* 若, and *Shi* 使 in Pre-Qin Chinese

Liu, Cheng-hu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Although it is well-known that *gou* 苟, *ruo* 若, and *shi* 使 in Pre-Qin Chinese marked protases of conditional sentences, it has rarely been mentioned that they differ in their expressive meanings. 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the origins of these morphemes and their semantic extensions in order to account for their functional distribution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ruo* 若 marks a relative or uncertain premise; *gou* 苟, an absolute premise; and *shi* 使, a premise for non-factual conditionals. Moreover, these protasis markers are not obligatory for conditional sentences, and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y are used only when the speaker intends to make explicit his/her attitude of expression, i.e., subjectivity of utterance.

Key words: conditional sentences, protasis markers, expressive meaning, subjectivity of utterance

(收稿日期：2009.3.4；修正稿日期：2009.8.4；通過刊登日期：2009.10.16)